

毛泽东大柏地战斗的

□ 钟燕林

李文彬旅和刘士毅旅的围追堵截，屡次陷入险境。

在大余县，与李文彬旅激烈交火时，红4军第28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后在转移途中牺牲。在安远县孔田镇摆脱了李文彬旅的夹击后，红4军连夜向寻乌转移。在寻乌吉潭圳下村，又遭刘士毅旅两个团的偷袭，伤亡很大。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受伤被俘（后在赣州英勇就义）。在福建武平和江西会昌边境的罗塘，红4军再次遭到刘士毅旅的阻击。

队伍行进到瑞金武阳境内时，抓到了一个20多岁、身材结实、形迹可疑的年轻人。经盘问，得知这个年轻人叫谢仁鹏，瑞金安治人，是瑞金早期的革命积极分子、共产党员谢仁鹤的弟弟，曾参加过国民党军蓝玉田部，因看不惯蓝玉田部的腐败，与杨斗文（武阳螺石人，是瑞金早期共产党员）一起携枪跑了出来。为躲避追杀，他们藏在武阳的山坳里，不料却与红军队伍巧遇。出于好奇，谢仁鹏跟着部队走了一会儿，没想到被警惕的警卫员当作奸细抓了起来。

问清缘由后，毛泽东命人给他松绑，并请他当红军的向导，谢仁鹏欣然应允。谢仁鹏对敌情很了解，又熟悉本地地形，在他的带领下，红4军专门走小路、走捷径。他们经过武阳的连坑，翻山越岭来到云石山境内，准备从沙洲坝、黄柏的小路直奔大柏地。而国民党追兵由于对路况不熟悉，被红4军远远甩在后面，拉开了将近半天的路程，为接下来红4军在大柏地打伏击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冒险夺报知敌情

红4军行至沙洲坝乌石垅时，毛泽东派一支小分队突入瑞金城内侦察敌情并收集报纸。贺子珍自告奋勇地要加入侦察小分队。出于对贺子珍的安全考虑，朱德不同意。倒是毛泽东了解自己的妻子，同意让她去了。

朱德命令第31团第1营第2连连长张宗逊率部突入瑞金县城；第28团绕过县城继续向北，在黄柏待命；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县城周边策应，待小分队回来再一起撤离。

当时驻守瑞金县城的是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混成第2旅郭风鸣的一个营，本是土匪出身，被国民党收编，平日里只会欺压百姓，真正打起仗来贪生怕死。他们听到探子报告有大队红军朝县城开来，而且是大名鼎鼎的朱、毛红军，于是惊慌失措地卷起细软躲到城外去了。

时近傍晚，红军小分队未放一枪就进入了瑞金县城。贺子珍和张宗逊进到县邮局，从邮局柜台上、墙角的报纸堆里，按日期挑了一些报纸捆起来，迅速撤离。岂料他们刚从邮局出来，就遇到折返回来的敌人。敌人仗着人多势众，朝贺子珍一行人开枪。张宗逊立即指挥部队就地散开，边打边退。贺子珍在张宗逊等人掩护下，抱着报纸骑马往回返。

此时，毛泽东、朱德、陈毅正在距黄柏圩五华里的松林里休息，等待贺子珍他们回来。猛然听到县城方向传来枪声，陈毅登上土坡向远处一望，发现几十个敌人正在追赶策马而来的贺子珍等人。他立即带领30余人

直扑敌军，张宗逊也带领小分队返身杀入敌阵，一举将敌人击溃。

贺子珍在黄柏圩追上军部，将一大捆报纸递给毛泽东。当晚，毛泽东和朱德查阅报纸，得知一路尾追而来的是国民党军刘士毅旅第29团和第30团，约2000余人。

顺应军心打伏击

红4军行进到大柏地境内时，已是2月9日，正是农历大年三十。这时，军部命令部队往宁都方向开拔。

当红4军担任前卫开路的第31团第3营走到瑞金黄柏圩、隘前一带时，敌人刘士毅旅、肖致平团等“追剿”军也到了瑞金境内，两者相差不超过3个多小时路程，情势很危急。行军休息时，前卫第31团的一些战士围拢到第3营党代表罗荣桓面前，说：“天天被敌人撵着跑，这都年三十了，还要往哪里走？党代表，向上级反映反映，打一仗吧！不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我们休想安生。”

罗荣桓同营长陈正春商量后，跟军部反映了战士们意见，向上级请战。听了罗荣桓等人的汇报，毛泽东、朱德立即召开前委紧急扩大会议，顺应军心，果断作出决定：此仗必打，以振军威。因为他们心中有数：大柏地距瑞金城北30公里，其南端从隘前、麻子坳到大柏地，是一条南北走向长约6公里的峡谷。两旁山高林密，一条曲径绕行谷底，直通宁都，是打伏击的极好场所。

王家祠里定妙计

随后，毛泽东在王家祠主持召开会议，决定利用大柏地有利于伏击的地形，诱敌深入，歼灭尾追之敌。红4军营以上干部齐集王家祠内的军部，大家听说要与刘士毅大干一场，都很激动。

毛泽东先向大家介绍了敌情，然后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大家的战斗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

朱德介绍了作战思路：从黄柏的龙角山进入大柏地圩镇，是一条两边群山对峙的地形，整个地方叫麻子坳。圩镇前面的村庄叫杏坑（即前村），这里稍为宽阔，是个设伏的好地方。这次要打他个伏击、歼灭战。

参谋长朱云卿详细讲解了战斗部署：第28团第2营为前哨营，在杏坑附近占领有利地形，掩护主力红军在大柏地的安全展开，然后撤至大柏地附近担任军预备队；第28团第1营从右翼向敌侧后迂回，断敌退路；第28团第3营在牛寮坑东侧高地占领阵地，担任正面阻击任务；第31团及军部特务营担任向敌右翼侧击的任务。

将士鏖战壮军威

2月10日下午两时左右，追敌刘士毅旅先头部队在黄柏与大柏地的界山龙角山同我军接上了火。第2营营长萧克和营党代表胡世俭命部队故意将行李摆放在路边，与敌人打一阵，退一阵，佯装败退，将敌人引入杏坑附近麻子坳红军布下的“口袋”。

但敌人似乎识破我军计谋，追了

不远，旋即后退到县城。朱德分析，敌人怕中计，生怕跟我们打山仗、打夜仗，估计明早敌人主力会全线追来。毛泽东随即命萧克继续在龙角山设伏，并命侦察人员深入县城附近监视敌人主力动向，一有情况，马上汇报。红军主力除制高点留少数部队外，其他人下山休息，明天天亮前进入伏击阵地。

次日凌晨，大雾、细雨，能见度极低。上午9时左右，敌人全部钻进了红军设的伏击圈。敌人进至杏坑北侧时，红军开始反击。第28团第3营由右翼迂回，第31团第3营由左翼攻击。10时许，敌人继续向大柏地前进。这时，第28团第2营加入战斗，从正面攻击敌人。第28团第3营迂回到杏坑南侧的茶亭寨，歼灭了敌军指挥所，截断了敌人的退路。朱德见时机已到，一声令下，红军将士们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但是红军毕竟子弹少，沿途又有损无补，火力薄弱，逐渐出现僵持局面。

生死存亡关头，朱德指挥伏在半山坡作为总预备队的独立营和直属队向山下猛冲。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也拿起一把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锋。身边的警卫排长受伤了，毛泽东仍奋不顾身地向前冲。朱、毛深知，红4军生死存亡，在此一举。红军以泰山压顶之势扑向敌人，于正午时分全歼被围之敌，俘敌800余人，缴枪800余支。可以说，大柏地战斗是红4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场战斗。

荣光背后，离不开烈士们的牺牲。一些年轻的红军战士为了大柏地战斗的胜利，长眠在这片土地。因时间紧迫，红军匆匆打扫完战场，雇请当地百姓一起埋葬战士遗体。看到有些战死的红军衣衫破烂，没有穿鞋，老百姓跑回家里找来一些衣物、草鞋，为他们穿上。因为当时条件简陋，所以连一个墓碑也未立，为了便于日后辨认，他们在墓前放了些青砖，刻上一个五角星，以示纪念。

不朽诗篇美名扬

大柏地一战，是红4军主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使红4军摆脱了一路被敌人尾追的困局，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赢得了民心，为之后在赣南、闽西广大地区创立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毅于当年9月1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高度评价道：“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1933年夏，已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再一次来到大柏地。

这天午后，恰雨过天晴，一挂彩虹高悬天上，群山苍翠欲滴。毛泽东环顾四周，摸着路边农舍墙上的累累弹孔，忆起当年红军在这里拼死打伏击的场面，心潮澎湃，诗兴盎然，吟成《菩萨蛮·大柏地》一词：“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摘自2019年12月8日《解放军报》）

陈云：“要会打算盘”

□ 曹伟明

陈云的一生，都与算账和算盘结缘。晚年的陈云还曾戏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所以，他在工作经常召集有关人员到他的住处，围绕一个问题，一件事情，边拨算盘，边思考酝酿。

他要求党员干部“学会做共产党的商人”，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要会打算盘”，还要学会打“大算盘”。所谓打“大算盘”，就是要善于谋大局、谋大事，善于从战略高度考虑问题，善于抓住问题的要害和症结，善于驾驭复杂形势和局面。陈云自己正是这样做的。

1961年，为了寻找国民经济摆脱困境的办法，陈云再次来到了上海青浦农村，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蹲点调查。他马不停蹄、夜以继日地访农户、下田地、看猪圈、召开各类座谈会，实事求是地查找问题的症结所在。他用“打算盘”的方

法，审时度势，客观冷静地算了一笔笔“三农”发展的经济账，反映了农民的心声，形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青浦农村调查》报告，充满了独具匠心的眼光和智慧。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打好算盘，算好民生账，密切党群的血肉联系，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之所在。周密、系统、正确的调查研究，正是我们当前攻坚克难、适应新形势、迎接新常态所必须具备的智慧和能力。

陈云实事求是的调研思想，善打算盘的辩证思维，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代代相传。

（摘自2015年7月13日《北京日报》，原标题为《“我是算账派”》）



陈赓智取直罗镇

□ 邓亚斌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后，蒋介石调集13个师另5个旅的兵力，对陕甘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妄图围歼红军主力，摧毁陕甘根据地。

11月18日，毛泽东在张村驿主持召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战役动员与部署。认为直罗镇三面环山，只有一条由东到西的大道穿镇而过，非常适合作战，决定把敌人放进直罗镇，来个瓮中捉鳖、关门打狗，打一场歼灭战。

19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陈赓率领经过整编的红十三团潜伏在东村、永川府一带就地隐蔽待命。乘着夜幕，陈赓率领几名战士登上山头，仔细察看道路、山岭、河流，结合地形地势，研究作战部署。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次战斗的对手就是以狡猾著称的牛元峰的敌一〇九师。

20日，在红十五军团一个连和县游击队的引诱下，敌一〇九师少将师长牛元峰率其全师外加一一师一个团，在6架飞机的掩护下，闯进直罗镇。敌方盲目冒进，认为红军已经被打败，便杀鸡宰羊喝酒以示庆祝。殊不知，这时的牛元峰已经钻进了我军设伏的“口袋”里。

直罗镇战役结束不久，陈赓调任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师长。

（摘自2018年第6期《湘潮》）

志敏撰写的文件“都是用农民易懂的字句，写出人们的情绪和确实可行的办法，以解决当前的困难问题，指出奋斗的光明的远景”“是整工作人员官僚主义的一副圣药”。

为防止出现脱离群众，方志敏创造性地推行了“巡视制度”，规定各级苏维埃仅留三分之一的人负责机关日常事务，其他三分之二的人都必须经常出去巡视。以德兴县为例，县苏维埃共有13名干部，经常只有一两个人守机关，其余都深入到一线区乡工作。工作一段时间后，巡视人员全部回到县里汇报工作开展情况，研究解决工作中的困难，讨论决定下一步工作计划，然后回到各自联系的地方继续工作。通过这种“巡视制度”，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苏维埃的方针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方志敏的带领下，赣东北苏区的党群、干群、军民关系非常和谐，群众把共产党、苏维埃和红军看成是“命根子”。

（摘自2017年5月29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方志敏是赣东北苏区的主要缔造者，他情系群众，在斗争实践中形成了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群众观念，成为我党早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先驱。方志敏出生在江西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一个农民家庭，切身体会到农村生活的艰难，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他憎恨土豪劣绅，内心深处自小萌发了怜农爱民思想和追求光明的渴望。1927年底，方志敏等领导了弋（阳）横（峰）两县农民暴动，创建了赣东北苏区。为保障贫雇农的利益，1928年11月，方志敏领导颁布了《临时土地分配法》，将豪绅地主和一切封

方志敏的群众观

□ 何立波

建祠堂庙宇的土地全部没收，以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均进行分配且归农民所有，还颁发土地证确权。这一举措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贫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同时，苏区内农副产品产量迅速提高，物价下降，“四块钱一担米，一块钱八斤肉”。群众兴高采烈地唱道：“谈谈苏区景呀，同志们听一听呀，苏区的幸福说不尽呀，工人天天有工做，穷苦农民有田分，生活好得很哪。”广大工农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和苏维埃是真心实意地为他们谋利益的，他们对苏维埃的信仰和拥护日益提高。

如何改善群众物质文化生活，这是方志敏时刻在琢磨的事情。如针对农民购买农具、耕牛或做小生意缺少资金的问题，食盐及各种日用品缺乏问题，还有婚姻、孩子上学、开办俱乐部、清洁卫生、白区迁入群众的安

置、老弱病残救济直至桥梁路等问题，在方志敏的关心下，都被苏维埃列入议程，想方设法妥善解决。也是在方志敏的倡导下，赣东北苏区（1932年11月改称闽浙皖赣苏区）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各乡有列宁完小，各村有列宁劳动小学，15岁以下儿童能够入学。苏维埃政府实行扫除文盲教育，广泛开办了工农夜校和识字班。1930年底，赣东北苏区在全国苏区率先创办了妇女职业学校——省三八女子职业学校。苏区非常重视发展群众文艺，积极创办群众文化娱乐场所——红色俱乐部。以乡或较大的自然村为单位，共建有俱乐部400余个，经常开展读报活动、教唱革命歌曲、演文明戏等。

针对广大群众的卫生和健康状况，方志敏提出要给予苦群众普及卫生常识，经常组织卫生运动，开展卫生检查，发放卫生宣传单。他指示苏

区各地积极开办工农药店，要求红军医院尽可能免费为当地群众看病。为增强人民体质，苏区发出了“要尽量发动群众的体育运动”的号召，接连几年春季和秋季，省苏维埃都举办了体育运动会。方志敏还亲自设计和筹划修建了供广大群众休闲的列宁公园、游泳池和红色广场，深受群众欢迎。

为提高做群众工作的水平，方志敏经常深入基层调查，掌握一手资料，作为决策依据。为研究分配好土地的问题，他曾多次到农村调查，对土地政策作了修正。1930年秋，方志敏从景德镇返回葛源，沿途作调查，发现形势好转以后的地方政权压迫命令、打骂群众，有脱离群众倾向，甚至贪污腐化，丧失阶级立场。为此，方志敏写了《苏维埃与群众关系问答》的通俗小册子，教育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防止和克服各种错误倾向。各县以此小册子为教材办了干部